

WENHUA GUOQING

独联体国家文化国情

(附：波罗的海三国)

李明滨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独联体国家文化国情

(附:波罗的海三国)

李明滨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联体国家文化国情/李明滨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8

ISBN 7-301-06581-7

I. 独… II. 李… III. 文化—概况—独联体 IV. G1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9549 号

书 名: 独联体国家文化国情

著作责任者: 李明滨 主编

责任编辑: 吴泽霖 张冰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581-7/G·0895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0.5 印张 302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本书执笔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田小满	孙曼	安胜杰	刘江平
刘莹	刘涛	刘震霞	余志茹
李明滨	张婉瑜	何皓瑜	岳小文
郑惠康	禹春景	郭利	唐登俊
奚凌云	章锐	鲍素红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编 东欧平原四国

第一章 俄罗斯联邦	(15)
第一节 概述	(15)
第二节 地理环境	(24)
第三节 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历史演变	(37)
第四节 文化	(53)
第二章 乌克兰	(85)
第一节 概述	(85)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历史变迁	(90)
第三节 文化	(98)
第三章 白俄罗斯共和国	(118)
第一节 概述	(118)
第二节 历史变迁	(120)
第三节 文化	(123)
第四章 摩尔多瓦共和国	(130)
第一节 概述	(130)
第二节 社会历史发展	(131)
第三节 文化	(134)

第二编 外高加索三国

第五章 阿塞拜疆共和国	(141)
第一节 概述	(141)
第二节 历史变迁	(144)

第三节	文化	·····	(146)
第六章	亚美尼亚共和国	·····	(152)
第一节	概述	·····	(152)
第二节	国家的形成和历史变迁	·····	(155)
第三节	文化	·····	(158)
第七章	格鲁吉亚	·····	(165)
第一节	概述	·····	(165)
第二节	国家的形成和历史变迁	·····	(168)
第三节	文化	·····	(171)

第三编 中亚五国

第八章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	(181)
第一节	概述	·····	(181)
第二节	国家的形成和历史变迁	·····	(186)
第三节	文化	·····	(191)
第九章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	(198)
第一节	概述	·····	(198)
第二节	国家的形成和历史变迁	·····	(201)
第三节	文化	·····	(204)
第十章	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	·····	(211)
第一节	概述	·····	(211)
第二节	历史变迁	·····	(215)
第三节	文化	·····	(219)
第十一章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	(225)
第一节	概述	·····	(225)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历史变迁	·····	(229)
第三节	文化	·····	(233)
第十二章	土库曼斯坦	·····	(239)
第一节	概述	·····	(239)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历史变迁	·····	(242)
第三节	文化	·····	(247)

附:

第四编 波罗的海三国

第十三章	立陶宛共和国	(257)
第一节	概述.....	(257)
第二节	国家的形成和历史变迁.....	(259)
第三节	文化.....	(264)
第十四章	拉脱维亚共和国	(271)
第一节	概述.....	(271)
第二节	历史变迁.....	(273)
第三节	文化.....	(280)
第十五章	爱沙尼亚共和国	(286)
第一节	概述.....	(286)
第二节	历史演变.....	(289)
第三节	文化.....	(296)
附录:地名人名中俄文对照表	(303)
后记	(326)

绪 论

—

苏联自1991年12月解体,分裂成15个独立的国家,迄今已十有余年了。一个昔日在实力上足以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似乎从此一蹶不振,在世界上威信丧失殆尽了。究竟这些独立的国家现状如何,这不能不是国人普遍关注的一个国际问题。

这15个国家都经历了剧烈的震荡,随后有些国家又于同年年底重新组成了“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先后加入的国家有12个;而波罗的海三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未加入。从形式上看,独联体仅是松散的联合体,已非以往“共和国联盟”的模样。

15国都宣布国内在实行改革,而且确实引起了各自社会的动荡。以其中最大的国家俄罗斯联邦来说,它在联合国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而取代了苏联在安理会中常务理事国席位的,它的状况如何,自然会引起世界更大的注意。那么十多年来,它的变革究竟进行得怎么样了?那存在了75年(1917—1991)的社会主义制度一朝变动,便顷刻瓦解。是不幸而应了许久以前的一种“预言”,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社会彻底蜕变了呢?还是经过艰苦探索,努力挣扎,不断改善,越来越好吧?这尤其是为国人最关切的问题之一。

在这段时间里,俄罗斯直接选举的总统已经换了两任,国内政治生活动荡了十年,如今已显现出乱而后治的景象;经济开始复苏,由计划经济走向了自由的市场经济;在国际舞台上日渐恢复往昔的活力,已经具备供人加以评论的稳定条件。其他的独立国家也大体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从国情的各个方面看,比较来说,政治、经济和体制的变革是快速和显而易见的,媒体都及时作了报道,能给人迅速提供必要的信息和作判断的依据,因而本书无须也不可能像媒体那样作跟踪的报导和评论。而文化领域的变动则比较缓慢。地理资源、经济基础、历史

传统、文娱生活、社会习俗等方面相对显得稳固,演变相对滞后。但这些方面恰恰是国家实力之所在,更具潜能而毋庸置疑。尤其文化传统、教育水平和科技成就,往往能够说明一个国家的变化之必然和之所以然。以俄罗斯为例,它并不是如人们最初简单的印象,以为在苏联解体后仅留下十五分之一的实体和实力,而是仍占有原苏联的约三分之二国土和一大半人口资源,并且拥有前苏联那些高度发达、高等水平的科学技术成果,其军力和国力依旧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况且,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民所受到的高度教育素养也保障了这样的大国不会在一次历史大转折中沉沦,而会使其有希望再生。其他独立国家自然也会各自奋进,求得新生。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把写作本书的重点放在文化国情,以期对15个国家最基本的状况作简要的撰述。

二

来自外语系科的一部分外事工作者,往往存在着三种“单一”的局限,即来源单一、知识结构单一和经历单一。以俄语专业人才而论,他们的出身限于俄语院系,知识面限于俄语语言文学,生活经历也大多仅限于在国内外事部门和我国驻外机构等单位。为打破这种局限,高校教育做了不少工作,主要在改变知识结构单一的局面。因而为了扩大俄语专业学生的知识面,有必要开设俄罗斯学方面的课程,增进对俄国国情的了解与研究。

“俄罗斯学”在我国国内尚未流行开来,不像国外研究中国的学科早就有“汉学”(“中国学”),他们把这样的专业人才称为“汉学家”,在我国则不习惯于“俄罗斯学家”这种称呼,过去顶多称之为“俄国通”,用的是大白话,并未提到学科的高度来认识。

那么,可否依惯例,把“русист”一词用来称呼这类专门人才呢?答案是“不完全”的。它只有“俄罗斯语文学家”、“俄语系学生”之意。实际涵盖内容较窄。从学科上来看,应该说,从事俄罗斯语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称为俄罗斯语文学(русистика),从事俄罗斯国情学的教学和研究,则称为俄罗斯学(русология, россиеведение),两者的内

容虽然有交叉,但其各自的学科范围却有明确的区别。

问题牵涉到对俄罗斯学的概念及其理解。什么是俄罗斯学?它就是以俄文原文材料为依据的、研究俄罗斯国情的各门学科之总和,特别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总和。其中包括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考古学、文艺学、词汇学、语文学、古文字学(字体学)、史料学、社会学等等。

这里首先要对学科作广义的理解,以区别于过去的狭义“俄罗斯学”(俄罗斯语文学)。在过去,人们常常将它理解为仅仅是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或者对俄语(俄文)的学习和掌握。那种理解显然不够,更不可把非语文学领域的成果通通视为非俄罗斯学的成果。过去西方对汉学的理解,就是曾经把它等同于中国语文学,从而排斥一切非语文学领域里的成果。

我们要注意这种区别的理由还在于,20世纪以来,世界对俄罗斯(包括苏联时代)的研究出现了分科化的强烈倾向,对俄苏的史学、文学、语文学、词汇学、哲学、社会学,尤其是政治、经济等各分支学科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自然均应视为俄罗斯学的组成部分。对整个学科来说,当然应该要求全面、整体化,而对俄罗斯学家的要求,则不可能面面俱到。作为个人,只要在某一个分支学科有造诣,都应得到承认。

其次,这个概念的另一层意思是,俄罗斯学研究必须,而且主要是依据俄文(俄国)的材料,即原文资料,因此,应该把从事俄国研究的俄罗斯学家和描写过俄国的作家相区别。前者通俄文,有丰富的俄国文化知识与理论,能直接利用俄文的原始资料,且运用自如,不必借助于翻译,或其他第二手资料;后者只是描述俄国,不一定都要掌握俄文的原文资料。

由此出发,我们评价一个俄罗斯学家的水平,首要的应当看他对原文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对于俄罗斯学家来说,原文就是一种特别的专业。

再次,俄罗斯学家不仅要会从事文字或口头的翻译,而且要从事研究,是学者型的,因而他应具备扎实的有关俄国的基本知识和开阔的眼界,同时又有中国和世界的相关知识,以便在研究国情时进行比

较研究。

如此看来,俄罗斯学的对象,首先是俄国的国情,当然包括俄国的过去与现在。其中有一个问题要特别说明,即对于苏联的研究。虽然苏联已经在1991年12月解体,产生出15个独立的国家,目前很难用某个新的名称对上述地域加以涵盖,是故我们国内的苏联学研究所自90年代起纷纷更名为俄罗斯学研究所,但我们研究的对象仍然包括历史上的苏联(它是整整的一个历史时代),同时也注意其现今的延续。

为了表达这层意思,即延续历史上的习惯称呼,对俄罗斯学有时亦称为俄苏学。

同时,为了有针对性地发展本学科,应当对中国人过去和现在从事俄罗斯学研究的业绩和存在的问题加以概括,以便总结过去,指导未来,因而必须把中国的俄罗斯学史作为本学科的第二个方面。

此外,对一个国家的“形象”了解,往往是国情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赋予一个国家以什么样的“形象”,其说法常常来自于民间,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是专家学者与民间结合的一种办法,即重视千万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把学者的研究用民间的“形象”说加以检验,反过来也能够纠正“形象”说的偏颇。

在民间,中国人对俄罗斯(苏联)的“形象”认识曾经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老毛子”到“老大哥”,然后到“老修”。这是历史了,既有他们性质的变化,也有我们认识的偏颇。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已经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俄关系开始了新的时期,会有新的“形象”说法出现的,例如说“老伙伴”。

为了预计学科的进展,理应回顾一下我国俄罗斯学的发展概况。

自1708年清朝康熙帝下令创办俄罗斯文馆以来,我国就持续不断培养出了几代俄文人才,随着中俄关系的发展,两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从而促进了我国对俄罗斯的研究,引起了俄罗斯学的发展,总体说来,中国的俄罗斯学经历了四个时期。

1. 酝酿时期——从中俄早期接触到第一批俄文学校的创办,即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

1708年创办俄罗斯文馆至1862年该馆并入京师同文馆,历经

154年;从1863年京师同文馆设立俄文馆到1900年由于八国联军入侵而停办,又经历近40年。近两百年间培养出不少俄文人才,但中国的俄罗斯学并没有形成,只完成了设立培养俄文人才的基地,对学科研究并无多大建树,虽然其间也有官员赴俄或到达边境从事交涉、谈判,有人并留下著述,如阿额觉罗·图理琛(1667—1740)的《异域录》。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后来接纳了京师同文馆,并于1903年改为大学堂的译学馆,下设英、法、德、日、俄五科,学制五年,首次把翻译人才的培养放到高等教育的水准上,这对未来的俄罗斯学无疑是有力的促进。

2. 形成时期——从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俄罗斯学进展明显,人员急速增加,参与介绍俄苏的有三部分人,一是革命者和革命文化人,虽然不都懂俄文,但为了介绍新思潮和新俄文化,都透过各种外文来译介。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茅盾、郭沫若、郑振铎等都有这方面的著述。二是直接赴苏俄考察,懂俄文、能描述现实新况的人士。第一个在新俄采访的瞿秋白写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著作,耿济之在苏联期间译出一系列文学名著。三是在国内兴办俄文学校,从事培养人才的教师,京沪和东北各地都有,如北京俄文专修馆、上海外国语学社。持续久、影响大的是北京大学俄文系,开设学科门类完备,并聘有俄苏籍教员。尤其出现了张西曼这样的代表人物,是中国俄苏学形成的标志。张西曼兼备通俄文,具学术素养和做出研究成果三方面的条件。他早年留俄,深谙苏俄国情,从事革命和教学实践,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和北京各校任俄文教员,有多种著译。他作为俄文教授最早于20年代初推出《俄文文法》(1922)、《中等俄文典》(1923)、《新俄罗斯读本》(1925)等系列教材,成为中国俄语教育史上的开拓者。

3. 缓慢进展时期——从20年代末至1949年

在上一时期,俄苏学虽已初步形成,但仍不完备,尚缺乏有成果的学者群。20年代末起,北京军阀旧政权又实行反动政策,限制和打击与苏联有联系的文化人,迫害革命者。这使得俄苏学的进展步

履维艰,在这个时期,它主要依据革命与社会运动的需要而开展。因而实践性强,正构成了中国俄苏学的特点。

这个时期也有三部分人在活动。一是以几个文化团体为依托的人士。如30年代“左联”的瞿秋白、周扬等,三四十年代中苏文协的张西曼、曹靖华、戈宝权等,40年代时代出版社的姜椿芳、叶水夫、孙绳武等。曹靖华则以译介苏俄革命文学而成为译界的旗帜。一是在苏联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工作的中国学者萧三、唯真、陈昌浩、李立三等,主要是译介马列主义和苏联革命书籍。一是在俄语院校任教,在延安如马列学院的张闻天、师哲,延安外国语学校卢竞如等,在国统区如西南联大的刘泽荣等。至1949年底,全国205所高校中设俄文系科的有十三所,合计教师145人,学生984人。

4. 快速发展和完备时期——从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

50年代初全面“学习苏联”的形势促进俄苏学的大发展,六七十年代两国关系一度恶化,但本学科并未中断,经过调整反而有所加强与提高,学界从以翻译介绍为主转入以研究为主。以中国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苏联问题研究机构应运而生。高校大力培养俄文专业人才,学制和教材规范化。

80年代初正式提出“苏联学”名称。即在1982年中国成立了“苏联东欧学会”,开始使用“苏联学”名称。陆续出现大批研究成果,学者成群,学科走向完备,培养人才的教育制度也形成体系。目前俄罗斯学者主要分布在高等学校、各级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与政府各部委的研究机构三个体系之中。

同时,中国的俄苏学者也与国际上的同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以“苏联东欧学会”(现名东欧中亚学会)为代表,与国际“斯拉夫学会”发生联系,参加过在美国、英国、波兰等国举行的国际斯拉夫学者大会。以“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为代表,与莫斯科的“国际俄语语言文学教师协会”(МАПРЯЛ)发生联系,参加过在匈牙利、捷克、苏联等国举行的国际俄语教师大会。

三

高校开设的俄罗斯学课程,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北京大学具有注重国情知识教学的传统。早在蔡元培校长任内,自民国八年(1919年)开办的俄文学系,就设有文法、散文及会话、地理、俄国文学史、俄国历史五门课。其中有关国情知识的课程即占了两门,为五分之二。

新中国以来,从50年代初起,俄文系在侧重文学方向的同时,也开设了“苏联历史”,为一学年课,长期由历史系教授张蓉初讲授,使用的教材是苏联史学家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通史》(上、下册)。当时设课的指导思想是增广历史知识,不但为俄语学习提供语言背景,而且可为俄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历史背景。这门课设课的时间很长,直到60年代中期“文革”时才中止。

70年代初期,由于研究国家经济资源,了解国力和世界知识的需要,而开设了另一门课“苏联地理”,为半年课。由地质地理系教授陆卓明讲授。使用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的《苏联地理》(上、下册)为参考读物。该课只开设了几年。

实践证明,两门课都很有效果,而且很有必要。但由于各门课程都有本身的学科体系,均要求有作为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系统性,因而每课单独安排不免占用学时过多(如“苏联历史”一学年上下两学期均为每周3学时),使用的参考书籍篇幅太多,难于抓住重点,造成学生负担过重。当年又是凡设课即为必修,学生无选择余地。同时,单靠这两门课也不能涵盖国情知识的各个方面。因而有些时候不得不停开。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才有由俄语系教师自己开设的“苏联概况”课。

此外,使用的教材和配合国情现状教学的参考资料,都受时代的局限。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我国对外政策是“一边倒”的方针(即在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对垒中“倒向”苏联一边),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便是翻译或编译自苏联学者的成书,例如《伟大的苏联》(苏联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等,照搬苏联的讲法,没有自己的观点。到了六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变化,两国交恶断绝来往 20 年。使用的时事读物又走向另一端,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批判》(来自报刊时文),而历史课则采用《老沙皇侵华简史》(北大历史系编)。

难怪当 1986 年我国教育部审定的统编教材《苏联概况》(李海滨、郑刚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一出版,立刻引起苏联友人的惊叹,称之曰:“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次如此全面客观地介绍苏联的书。”言外之意是不再像过去走两个极端了。

1980 年设立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经过组织工作和审定批准程序,首次实现了俄语专业通用教材的统编和出版。此事在中国俄语教育史上的教材建设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计划编写的教材涉及专业的全部课程共 11 门(15 种教材),可分为四类:语言、文学、翻译、国情知识。而把后一类课的教材定名为《苏联概况》,交由北大主编,有北起黑龙江大学,经京、津、沪,南至厦门大学的 11 所高校教师参加,成为本专业统一的规范,基本解决国情知识讲授的宽窄和深浅程度问题。这使得该课程建设前进了一大步。此外,为解决有的学校拟在某个学科方面的深度有所突出,视各校需要,还列入配套材料《苏联地理》(黑龙江大学陈叔琪)、《俄国历史》(天津师大郑刚、东北师大刘庆宁)、《苏联历史》(北京外院李传明)、《苏联文化教育》(南京大学张才兰)等,均以单行本出版。至此,俄国国情知识课程已经形成规模了。

实际上自 70 年代以来,不但北大,而且国内高校的俄语专业都陆续开设了“苏联概况”、“苏联简介”一类的课程或讲座,加强介绍其国情的的工作。它对于学生扩大眼界,增广知识,了解俄语的背景材料,以促进俄语学习和提高文化修养,都极为有益。但是,正如《苏联概况》“编者的话”所说的,在当年“各校讲授内容的多寡和深浅程度很不一致,极需一本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程度深浅适中的教材,以利于保证教学质量”。该书的出现,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

该书编者总括过去设课的经验,认为:“过去各校讲授此课,内容一般是详地理和历史而略现状,显然不够平衡”。因而他们对于该教材在改善现状和该课程的安排,提出了设想。

制定编写大纲时注意改变这种状况,力求安排得系统一些,使本教材能够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学艺术、民族及风俗等都包括进来,设为三编十七章。

鉴于各校安排此课的年级高低不尽相同,收效也不一样。安排在低年级,可使学生及早了解苏联的国情,提高学习俄语的兴趣和自觉性;但因为是在学生初学俄语阶段,只能用汉语讲授,不能配合俄语技能和熟巧的训练。安排在高年级则可用俄语讲授,使学生既能增广知识又能提高俄语能力;缺点是失之太晚,而且用外文讲也有某些局限,有些方面也难于讲透。因而根据调查研究结果,该书编者提出兼顾两种情况的办法,即拟同时编选一本俄文的课外阅读材料,以供辅助选用。在此前后,各校都使用过自编的俄文国情材料、读本或参考资料。

但是,规定了国情知识的基础,并未解决俄语系科学生未来的专业去向,面对俄语学生未来择业路子不够宽的状况,人们普遍认识到,多数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并非限于俄语专业,而是仅以俄语为工具去为未来所选职业工作服务,因而还须为学生提供选择另一种专业方向的可能,由此俄语学界先后产生了两种主张,或者可视为两种设想:一、“一个半专业”,二、“打宽基础,专业分流”。

所谓“一个半专业”系指学生在学好俄语这个专业之外,再加半个其他的专业,例如经济或法律等等,即常说的“学外语(为主)要结合专业(为辅)”,以便将来工作时适应力增强。而“打宽基础,专业分流”则是指在低年级打宽和学好俄语基础,到高年级由学生按兴趣或走向分别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也是“结合专业”的意思,只不过后者的提法比前者更明确,分出了先后的步骤。

实践证明,无论哪一种主张都未曾在哪个学校行通。因为作为一种专业的俄语,要在大学四年之内学通,已经是相当繁重的任务了,学生再也无暇顾及别的专业。硬要推行的话,必然造成学业负担过重,只有少数能力优异的学生才能加以尝试,例如走选修“双学士学位”之路。自然,有些学校在这方面有各自的办法做试验,甚至取得成效。

在北大,经过多年探索,确定把“专业分流”由本科“推迟”到研究生阶段。况且,也不是分流到某一具体专业上去,而是设定在总的“文化国情”方向,旨在让学生经过研究生阶段之后,适应的职业面更宽。这既体现了较宽的方向,也含有比本科生提高一步的意思。从1995年起,俄语系在招收硕士研究生时,除了俄语和俄罗斯文学两个传统的方向外,再增加一个新的方向:俄罗斯国情学。此后每年坚持招收,迄今已有数届毕业生。

所谓国情学,实际内容很广,不是全部都能安排进来的。考虑到可行性,故进一步限定在“文化国情”(取“大文化”的概念)。而于1988年经由北大研究生院立项,作为一个学术课题由我们开始进行研究,并且把内容具体确定为三个方面。一为基本的国情概貌,包括物质的和制度的层面,二为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及演变,属于历史层面,三是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如文学艺术、民族风情、意识形态上的某些思潮等等。

四

本书取名为《独联体国家文化国情》。书中有些项目内容不免已在大学阶段的国情概况中出现,不过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从新的、文化的视角切入,目的在阐明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进展的特点。如有征引相同的事例也是力求解释出新意。

为便于从总体上把握,达到条理清楚,重点突出,书中还把独联体国家按地域划分成几编,即第一编,东欧平原四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第二编,外高加索三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第三编,中亚五国: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另外,把非独联体成员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作为附录第四编列入。全书共四编十五章。

本书是这个新课题的教学和研究的成果。参加者有本课程的教师和研究生,其中有五届研究生,他们是国情学方向的硕士生和选修此课的语言以及文学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采取边学习边研究的办法,有的在工作以后继续研究和撰写。作者分工负责各章或各章